

社会历史视域下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发展

◎吴文艳 杨 晶

1 引 言

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开拓了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事业。在新闻传播领域，他做出了特殊的理论贡献，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发展史上的宝贵财富。近年来，国内学界关于重新深入研究列宁新闻观的呼声越来越高，学者们先后指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不能缺少对列宁的研究”（高金萍、王纪澎，2020）、“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时，不能分割列宁主义的作用与影响”（程曼丽，2019）。本文认为，对于列宁新闻观的研究要深入历史发展逻辑，理解其理论逻辑。列宁深刻辨析社会历史矛盾，发展新闻事业来推进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从社会历史过程的视角研究新闻传播工作及其规律的理论特质。

2 发展东方社会形态下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西欧资本主义社会创立并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晚年的马克思、恩格斯为了更加全面地把握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其研究发生了空间转向。他们将视野投向了以俄国为代表的东方社会。他们看到，俄国的资本主义道路是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其内部发展程度明显落后于西欧社会，并且正处于“革命的前夜”。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社会的探索事业，他认识到俄国的无产阶级贫困化异常严重，人民大众“由于本能、感情和热望，都同情反对资本家的革命”（列宁，1917）。但是俄国在经济文化上的落后使革命主体性受到严重制约，人民群众在精神上缺乏革命的韧性，“批判的武器”无法转化为“武器的批判”。

人的发展程度决定着政治变革的程度，俄国民众阶级意识上的落后阻碍俄国的革命道路。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一方面工业化推进了历史进程，创造了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人无产阶级，另一方面私有制使劳动者同劳动产品之间处于异化关系，工人无产阶级代表生产力但是不占有生产资料。当劳资矛盾尖锐化时，无产阶级采用颠覆性的革命手段重组国家—社会关系，使人民群众成为生产资料与生产力的同一占有主体，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历史的狡计”就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孕育着这个

制度的掘墓人，工人阶级是自己解放自己的主体力量。然而，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状况完全不同于西欧社会。19世纪末的俄国完成了工业革命，但是俄国封建制与农奴制残余阻碍生产力向纵深发展，绝大多数俄国民众还是局限在宗法式与小商品经济之中，并没有成长为现代无产阶级。缺乏现代大工业训练的俄国无产阶级必然陷入狭隘的、地方性的、等级制的社会关系之中，这意味着无产阶级成员有反抗统治阶级的直觉，但缺乏推翻统治阶级的组织力。无产阶级成员只有将自身的利益诉求与科学理论相结合，产生成熟的阶级意识，认识到个人的行动是无法对抗反动的统治阶级，必须以整体性组织行动来实现阶级利益时，个人的利益才能如愿以偿。为此，“单凭突击、冲动、热情，是什么也做不成的；唯有组织、坚毅、觉悟才能有济于事”，人民群众着眼于眼前利益的自发性必须上升到对阶级共同体利益的自觉阶级意识，“不断地使自觉性战胜自发性”（列宁，1920）。

为此，报纸要积极发挥宣传鼓动作用，启发人民群众自觉阶级意识，让人民群众发挥出历史推动力量。马克思在创办《莱茵报》时说：“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他担心的不是群众掌握不了理论，而是写作者怎么把理论说“彻底”，这就要求写作者在社会实践中淬炼理论的力量。列宁强烈认同这一观点，明确要以实际生活和利益来引导人民群众的革命本能。他认为，实际生活是阶级意识的真正来源，但是在文化教育极端落后的俄国，有必要用新闻宣传工作激发阶级意识的能动性。

总之，列宁立足东方社会特征，探索新闻宣传与阶级意识的关系，大大扩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理论内涵。

第一，开展以“灌输论”为基础的新闻宣传工作。当时在共产国际内部，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崇拜自发性，否定客观现实与阶级力量，以卢卡奇为代表的“左派社会主义”一味地夸大工人阶级的“总体性”阶级意识，落入主观唯心主义的深渊。列宁认为，俄国革命有客观的社会基础与阶级力量，以此为基础，通过新闻宣传组织和鼓动人民各阶级的主观能动性就有了现实依据。1900年，列宁为《火星报》创刊号撰写了题为《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的社论。他指出，工人不可能自发地形成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它是由先进的知识分子基于社会发展现实的理论创造。在落后的俄国，无产阶级不可能通过民主教育方式掌握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列宁，1902）。看上去，“灌输”是一个精英色彩浓厚的论述，因而在党内引起了广泛争论。实际上，“灌输论”是针对东方社会革命实践远远落后于革命理论的现实而提出的策略。列宁一生的新闻实践以政治评论见长，发表的绝大多数新闻评论内容都是同阶级分析法揭露时事新闻背后的本质，引导人民大众的阶级意识与集体行动达成一致。

第二，开展以“科学的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新闻舆论工作。马克思、恩格斯在党的报刊上不断批判资产阶级“否定的意识”与“虚假的意识”来捍卫科学社会主义，列宁进一步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称之为“科学的意识形态”。党的报刊要宣传“科学的意识形态”，批判形形色色的“非科学的意识形态”。列宁（1900）在创办《火星报》时就

声明,“我们不打算把我们的机关报变成一个形形色色的观点简单堆砌的场所”。党的报刊应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办报方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同时,报刊鼓励发表党内各种声音,开展同志式的讨论,但是不能“把涉及重大问题的意见分歧掩盖起来”(列宁,1900),而应公开对意见分歧进行评论与指导,引导党内同志掌握正确的意见。

第三,党的新闻传播工作要照顾具体的受众水平。列宁按照传播原理指出,报刊的受众对象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党的报刊应根据受众的理论程度与文化水平做好分众化传播。他指出,无产阶级受众主要分为先进、中等与水平低三个部分。针对先进部分,党的报刊必须代表无产阶级的先进文化,不能迁就工人的最低水平,“它不仅不应该人为地降低自己的水平,反而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对于中等水平的工人,报刊则可以采用通俗化的口头传播或文字传播等方式。对于水平低的工人,报刊内容要“全面照顾地区、职业及其他方面的特点”(列宁,1899)。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列宁发展无线电技术,关注电视技术,开拓电影市场。站在传播角度,列宁认为无声的电视电影与无线电广播分别作为视觉与听觉媒体,是当时最适合在文盲率高达90%的俄国人民中间开展宣传工作的媒介工具。

3 发展资本主义垄断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马克思主义及其新闻观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哪个天才人物脑袋里蹦出来的,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制度成为主导趋势时代的产物。这个时代赋予马克思主义掌握人类社会基本规律的历史条件,同时随着时代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及其新闻观将继续发展所属时代的具体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自由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他们从宏观的社会传播过程视角分析资本“时间消灭空间”的世界交往特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电报等精神交往技术。马克思、恩格斯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过程中,在革命路径上,从实现人的“类”本质的政治解放演进到实现无产阶级利益的劳动解放,在思想武器上,从人民报刊的理念演进到无产阶级政党报刊的历史使命。1848年,马克思主义诞生,欧洲各国爆发资产阶级民主、民族革命。由于当时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力量较强,工人的组织性却很落后,马克思、恩格斯希望通过新闻舆论工作来鼓舞无产阶级群众。于是,他们在普鲁士莱茵省的科伦市出版《新莱茵报》,以此为阵地号召无产阶级不能因为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就陷入消极被动,应该积极主动组织起来,适时地转向社会主义革命。虽然这份无产阶级政党报刊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被反动当局查封了,但是它成功地发挥了发动群众、宣传革命、干预运动、组织斗争的功能。1871年马克思总结法国巴黎公社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缺乏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就此提出在各个民族国家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政党报刊也随之进入了大发展期。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发展党的建设学说,一方面发展党报理论与经验,他们利用报纸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做斗争,捍卫了党的组织的纯洁性与战斗性。但是,马克

思、恩格斯无论怎么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性，其政党形式都必须参照西欧资本主义政党，不能脱离西欧社会历史的条件。

与马克思、恩格斯完全不同，列宁处在资本主义垄断时期。恩格斯去世后，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国际组织的第二国际右倾机会主义抬头，在思想上整体停留在资本主义“和平”发展阶段，所有的活动都局限在议会、罢工等“合法”斗争范围内，其新闻自由理念局限于民主主义，彼此之间的信息交流建立在松散的自愿联盟基础上。虽然推动了各国政党之间民主交流，但是这也使第二国际组织缺乏高度集中的决策机制。这些都显示第二国际没有顺应时代变迁，做好转向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实践准备。列宁认为，第二国际必然要走向破产，已完成帝国主义过渡的俄国不同于西欧帝国主义国家，它兼具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与东方民主主义革命的双重任务，面对异常强大的反动阶级统治，必须要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所谓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就是不能照搬西欧资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形式，它应该是强有力的、集中的政党，因此不能仅靠党员对无产阶级利益的自觉代表来组建“自愿的党”，还要靠党的规章制度来建设思想上与组织上统一与集中的党。

列宁青睐《新莱茵报》的光辉历史，称赞它是“革命无产阶级最好的机关报”。他受其鼓舞与启发创办党的全俄机关报、改革编辑部体制，以此来强化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架构与集体领导能力，推进俄国革命进程。

第一，党的报刊要坚持党性原则。俄国沙皇政府比西欧资产阶级政府反动数倍，俄国人民深受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双重压迫，既受经济剥削又无政治民主。无产阶级政党没有结社自由与新闻自由，长期处于地下活动状态，很容易在党内形成各立山头的团团伙伙，破坏党的统一。因此，列宁要求党要从小组习气过渡到党性。毛泽东（1945）评价列宁的党性就是：“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集体主义。”党可以通过传播渠道把自己的意志与观念传播给每一个党员，以此让全党上下统一思想与行动。就此，列宁着手公开出版党的机关报。党的新闻事业之所以能够克服小组习气，就在于它“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列宁，1905），它要反映全党的共同意志。因此，党的报刊要首先坚持党性，服从党的领导，才能充分发挥统一全党思想的作用。

第二，党的报刊要发挥“集体的组织者”的作用。列宁看到，在无产阶级政党无法公开活动、只能采取秘密活动的条件下，党的出版物是思想上组织政党的武器。“创办全俄政治报应当是行动的出发点，是建立我们所希望的组织的第一个实际步骤。”（列宁，1901）列宁组建《火星报》与《曙光》杂志编辑部，通过报刊的通讯网络将分散在俄国各地的马克思主义小组统一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实现了党的重建。《火星报》被列宁比作“基线”，它将分散各地的党小组与个人“串联”起来，它又被比作搭在建筑物周围的“脚手架”，它使党小组、个人与党中央紧密联系在一起。列宁强调党的报刊在党组织落实集中制中发挥积极作用，并不意味着党的组织和报刊就忽略民主制。从列宁的实践策略来看，当来自党外的挑战减弱，党内的团结更加自主，他就越提倡民主制的广泛实施，反之，组织的集中就会被强化。

第三，完善党的中央机关报体制。俄国无产阶级政党作为第二国际的支部，其

包括党报体制在内的党的组织结构体制都参照了西欧工人政党，这导致其无法应对俄国反动政府压制政治自由的现实。因此，列宁认为有必要改革党的中央机关报体制。1903年党的二大在列宁的倡议下，在党章中将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并列为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前者负责思想上的领导工作，后者负责直接的实际的领导工作，两个领导机构要在恪守党纲的基础上确保行动一致。但是在实践中，这两个机构之间分歧重重。1905年党的三大明确中央委员会是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由其任命中央机关报编辑部。1912年党的布拉格会议最终确认了党的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和监督机关报编辑部的体制。

4 发展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事业

马克思、恩格斯以其理论洞见与亲身实践探索了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活动的新闻传播规律。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习近平，2013）。这也就决定了，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具体思考过无产阶级政党执政时期的新闻传播事业发展规律问题。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宣布，国家的最高权力全部属于人民，最关键的就是生产资料从剥削阶级手中转归为全体劳动者所有，这其中也包括新闻出版业的生产资料。列宁起草的《关于出版自由的决议草案》中明确，人民享有出版自由权利的前提就是要将造纸厂和印刷所等相关的生产资料实现国有化，由国家分配给劳动者。随着人民群众掌握新闻传播权利并赋予媒体职业权利，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主题也就由无产阶级政党新闻事业拓展到社会主义新闻事业。

列宁作为国家领导人首次探索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中的新闻传播事业建设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第一，苏维埃报刊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1918年春天，列宁领导苏俄退出世界性的帝国主义战争，并提出工作的重心要转移到管理俄国和发展生产上来，苏维埃报刊同样应该“从为政治和军事服务转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列宁，1918），概括起来就是“多谈些经济，少谈些政治”。俄国革命时期，政权不在无产阶级政党手中，党的报刊的重心是宣传革命口号、鼓动革命热情。随着党获得执政权，苏维埃迫切的任务就是用实实在在的经济建设及其成果来兑现党服务人民群众的承诺，苏维埃新闻工作也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来展开，“生产宣传应当重新放在第一位”（列宁，1920）。为了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报刊应加强对生产和建设的宣传，调动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

第二，报刊具有商品属性。马克思、恩格斯在西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多次论述过报刊的商品属性问题，但是他们并没有研究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是否实行商品经济体制，及其与报刊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在列宁这里得到了现实回应。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干涉苏俄时期，列宁为了应对国内资源紧缺等困境，企图用军事化手段快速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一阶段，他片面关注报纸的事业性，重点强调报纸的职能主要是政

治社会化与劳动纪律教育。1921年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承认经济文化落后的苏俄完成社会主义过渡要经历一个复杂而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商品经济体制是实现小生产经济向大生产经济过渡的必要手段。正是从这个阶段开始，列宁关注报刊的商品属性问题。他指示人民委员会制定和颁布报刊收费的法令，将报刊的发行制度由分配制改为订阅制，结束了报刊免费发行的做法。在党的十一大上，列宁建议大会允许《真理报》刊登广告，承认报刊要通过广告增加收入，为报刊提升自身质量与竞争力提供经费来源。

第三，苏维埃出版物要夺取文化领导权。列宁晚年在“政治遗嘱”中提出来，党的工作重心要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列宁关于工作重心“转到文化组织工作”与“转到经济建设”之间是不矛盾的。他意识到，文化落后与经济落后是苏俄社会主义建设的两大困难，其中他更重视文化组织工作，因为文化关涉人的精神能动性，文化在苏俄的普及与提高，能使群众在经济上掌握提高劳动生产率所需的科学技术知识，在政治上提升保障民主权利所需的管理与监督能力。“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列宁，1923）无产阶级文化要善于吸收包括俄国传统文化与资产阶级文化在内的一切文化遗产，前提是党要掌握文化领导权。在党的文化领导工作中，列宁最重视的就是思想宣传与新闻舆论工作。新经济政策时期，面对私营出版业日益繁荣、消遣类图书异常热销的现象，列宁多次指示苏维埃图书出版业要沉下心来多撰写通俗易懂、贴近群众、喜闻乐见的出版物来讲清社会主义常识，回应民众关切的社会现实问题，扎扎实实地提升文化产品竞争优势，运用商品经济规律夺取文化领导权。

第四，发展先进媒介技术。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认真考察并详细论述了诞生于19世纪中叶的电报技术及其在世界交往体系中的革命性作用。列宁处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无线电技术是当时的新型媒介技术。一方面，列宁与马克思、恩格斯一样，从世界交往的角度论述了无线电广播技术的革命意义，它实现了信息从有线传输到无线传输的技术革命，列宁将这一新媒体特征概括为“不要电线的报纸”。另一方面，列宁又从社会主义国家利益的角度高度关注无线电广播的战略意义。在国内，列宁反复强调这项技术的成功将会给宣传工作带来极大的益处。俄国地域广袤，国内绝大多数人口与政治经济中心聚集在东部，远东地区地广人稀，东部地区面向远东地区开展宣传工作更加需要无线电广播的支持。在国际上，苏俄政府利用无线电广播与英、法、德等国实现了国际新闻的交流，同时对外传播苏俄宪法与新经济政策等信息，让西方世界更加全面而客观地了解苏俄与社会主义。

5 结论：列宁新闻观的现实启示

列宁的新闻观顺应世界历史趋势，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发展的重心由西方转到了东方。其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具体的新闻工作实际，发展了中国化的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的号召之下组织起来的”。(毛泽东, 1942)不能否认, 列宁新闻观对中国共产党的新闻组织架构、体制机制、职责功能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即便到了今天, 它对于当代中国新闻工作仍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第一, 坚持党管媒体原则, 牢牢掌握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权。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开启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并存与竞争的时代。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命力依然顽强, 它无法克服自身的根本性矛盾, 就把注意力放在意识形态领域, 时刻企图用普世价值占据道德制高点。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要在意识形态领域抢夺领导权。党是唯一没有私人利益的政党, 因而只有它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 只有它的党性是与人民性相统一的。坚持党管媒体原则, 就是要落实党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 凝聚全社会的共同理想, 集中反映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增强中国人民的精神力量。

第二, 构建现代传播体系, 深化对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当代中国所面对的时代主题已经从列宁时代的战争与和平转变为和平和发展,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现代化的时代趋势孕育着现代化的发展需求, 党的新闻媒体要通过实现新闻传播方式、媒介组织管理以及媒介技术的现代化, 来提升群众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获得感。

第三, 立足于中国最大的实际, 践行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这是党对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与现实方位的精准判断。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外发展状况, 制定“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通过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 争取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这段征途中, 党的新闻工作者要结合国情与社情, 牢记和践行团结人民和组织群众的职责与使命, 将职业信仰与民族信仰联系起来, 将党的奋斗目标与人民的根本利益联系起来, 发挥好思想宣传与舆论引导作用。

参考文献:

- [1] 祁涛. 列宁新闻思想中的方法论特质及其表达 [J]. 新闻与传播评论, 2019, 72(3): 20-27.
- [2] 童兵. 试析列宁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新闻思想与政策实践——为纪念列宁 150 周年诞辰而作 [J]. 新闻大学, 2020(3): 46-60, 118-119.
- [3] 程曼丽. 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可忽视列宁主义——兼谈从马克思主义的苏俄化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J]. 新闻与写作, 2019(11): 65-70.
- [4] 王飞霞. 新闻、出版自由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党性——读列宁《关于“出版自由”》 [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7(8): 4-7.
- [5] 刘建明.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经典性与实践性 [J]. 国际新闻界, 2006(1): 5-10.

作者简介：

吴文艳，女，1989年2月生，湖南衡阳人，翻译硕士，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印第安纳波利斯大学国际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国际新闻传播研究。

杨晶，男，1984年8月生，江苏无锡人，法学博士，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网络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政治传播研究。